

美丽中国——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发展的逻辑必然

孙金波

(温州大学 法政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美丽中国实现的必然性存在于我国传统文化之中。我国传统生态智慧凝结为生态哲学,不但提出了人对自然的正确态度,而且也重视人的主体性光大,最终建构了天人合一的终极目标。传统生态哲学成为我们党逐步完善和明晰生态文明执政理念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

关键词: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生态哲学;自然;主体性;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 B8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3)03-0023-06

“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义,表现出中国对世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理念和美好愿景。“美丽中国”已成为时下的热词,“美丽中国”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其核心和前提是生态文明,其本质即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全面实现。就我国传统哲学而言,其中内蕴丰富的生态智慧能够为生态文明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指导下,汲取我国传统生态哲学的智慧并付诸于行动,“美丽中国”的实现具有必然性。

一、自然观:顺从、敬畏、尊重与保护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是老百姓对“美丽中国”的最直观解读,反应出人们对美好自然环境的需求和渴望。此处的自然作为“他者”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类的观照对象。如此,人应该如何对待自然成为一个首先需要被回答的问题。我国古人对待自然的态度遵循着这样一种理路:顺从——敬畏——尊重与保护,最终达致和谐,呈现出一个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

人,从他一产生开始,便打量着、好奇着这个作为“他者”的自然界。生存是人的第一本能,人类的生存冲动构成了整个已有社会历史的恒久原动力。顺从自然是远古时代人的必然“选择”。当时人类所面对的自然只有部分地进入了视野,所展开的活动也只能是向其“索取”,“主体”与“客体”尚未有清晰的分别。“自然”的观念尚未形成,人们视之为混沌的存在,其处于如老子所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的状态。加之自然本身展示的图景是神秘莫测、威力强大,就连最日常的风雨雷电也让人震慑、恐惧,而“我”则呈现为一种微小的存在。在必然顺从的前提下,人们也试图与自然沟通,因而产生了原始宗教的内容。一些原始图腾的内容或为太阳、雷电或为鸟、蛇等动物,甚至“整合”出龙的图腾,这些元素都是与他们自身生活息息相关又极为神秘的元素。伴随着图腾内容的丰富,人也创造出诸多的拜祭仪式与禁忌内容,反映了先民顺从自然的被动与无奈,并希望获得庇佑。敬畏自然的观念几乎与顺从观念同时产生,但稍有不同。顺从基本上不是主体可以选择的,其前提是对自然的懵懂无知、恐惧,而敬畏的阶段是在人对自然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才产生,其中的主体有了一定程度的主体性意识,能够把自身当做有别于“他者”自然的一种存在。

尊重与保护自然是我国古代自然观发展到较为高级阶段的表现。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人的主体

性逐渐增强,开始主动“打量”对方,希冀了解更多,因而产生了初具保护与尊重自然的观念。商周之时,人的思维能力就达到一定高度,能够用比较抽象的符号和具有哲学味道的语言总结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周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周易·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意,以类万物之情。”《周易》中卦爻的图示以及卦爻辞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以“阴”“阳”为基本要素,总结自然界的阴阳变易规律,并推断出自然界的先在性,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特征。春秋战国之时,人们萌生出具有一定高度的尊重和保护自然观念。例如,周文王临终之际嘱咐武王要其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保护生物,认为国家治乱兴亡都要依赖生态的好坏。《逸周书·文传解》中记载:“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麝不卵,以成鸟兽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对草木鱼虫都要保持其“可持续”状态。齐国管仲比较明确地阐发了人不但要保护生物资源,而且可以利用生物资源的观点。《逸周书·文传解》中记载:“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因为“山泽林藪”是天财之所出,强调有限制地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着想。道家提供了人与自然相处的重要原则,即道法自然,要求人类保持自然的本来面目而不要妄自改变它。若违反自然规律而强加妄为,反而会带来灾难,故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即了解自然运行规律,否则必然是“凶”的结果。还主张人应时时有关爱、克制的品质,《道德经·六十七章》有:“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即温柔慈爱地对待天下万物;俭,即俭素,克制自己的欲望、保持朴质的本性。这一点对今天的生态主体而言尤其具有警示意义,人应该适当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肆意掠夺资源,有那种“不敢”的境界才行。庄子强调人应顺应自然,他借伯乐善治马的故事嘲讽违背自然的做法,在《马蹄》篇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锥之。”讽刺人的自作聪明——喜欢改变事物存在的本来状态,自以为是帮助对方,实际上却是在破坏一种平衡和稳定的存在,最终导致其生命力的消失。庄子的《知北游》指出:“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我们的身体、生命、性命都不是属于自己所拥有,而是大自然的赋予,那么,人类有什么理由自高自大呢?

在继承前人丰富生态智慧的基础上,孔子儒学发展并开辟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先河。与道家的自然观相比较,儒家进一步把保护自然的观念上升到了“仁”“义”的伦理高度。儒家的“仁”,不仅指亲亲、爱人,而且要推爱,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孔子甚至认为动物也存在“情感”并且可以引发人类的良知。《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而况乎丘哉!”。孟子特别强调“推爱”,对生命普遍尊重、仁爱生命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践行过程。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理性”是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亟待恢复和培育的内容。经历了儒道思想的洗礼,《易传》把《易经》的生态智慧提升到哲学高度,其内蕴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以及忧患意识特别可取,要求人常常反思自己的行为、检讨自身的过失。两宋作为理论思辨达到“登峰造极”高度的时期,哲人在思考自身的存在主题之时,对自然自觉保护的意识也更加强烈。邵雍易学思想中反映出时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达到了一定高度。张载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同类、同伴,所以我们要善待之。理学的“性即理”理论系统极力倡导人对欲望适度克制的理念,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应用到对待“自然”的态度上。

我国古代哲学中,儒道两家的自然观是中国生态哲学的主要来源。本土的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也都有丰富的“自然”观。例如,道教认为天地万物与人同源、同构以及同具有道性,倡导人应“慈心于物”的道德认知说,具有“仙道贵生”的道德情怀,践行“守道而行”的道德准则,这些构成道教生态伦理的主要内容。佛教的“缘起说”“众生平等说”以及“佛性”理论及至唐代湛然《大乘起信论》强调的“无情有性”思想都反映出佛教具有对自然(有情和无情)的尊重、善待、保护的观念。

顺应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尊重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秉持的首要态度;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承担的重要责任。古人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伦理观成为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资源。

建国初期,国家的重要任务是解决“物质”问题,而且环境问题也不太明显,所以未能引起学界的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的认识、利用程度、利用手段的加深,环境成为了“问题”,尤其是自然环境被破坏得最为严重。所以,必须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换的媒介是劳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人不但要视自然为“前提”,而且要认识到自己的“栖居”地位,同时,人类有维护生态平衡的义务。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和良性互动,二者之间的能量转化才能继续下去,也即达到真正的和谐。

二、人的主体性:三才、生命

有论者认为,我国传统哲学中主体性思想不发达,几乎被湮没在“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之中,因而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如此把有没有主体性思想与自然科学是不是发展等同起来的观点,恰恰是暴露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缺欠。其实,中国古代不仅有主体性思想,而且比西方人的主体性思想产生更早,并且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智慧和特色。

我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中确实展现了很多强调自然的内容,但强调更多和更重要的还是主体性思想问题。在主体性思想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崇三才思想(容纳人)、崇拜生命,推崇刚健有为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与西方传统文化注重“掠夺”自然和社会等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极端化主体思想不同,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崭新的关于天地人“三才”之间关系的整体和谐思想,呈现了人类生存观里最重要也是最聪明的另一极。夏商之时崇信鬼神,人的主体性思想有了萌芽,但很微弱。到了周时,周公的“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对天命观的冲击,表明主体性思想开始发展起来。子产关于“天道远,人道迩”的提法可以作为对西周时期主体性思想实际情况的真实表达。春秋之时,人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开始越来越深入。《老子》二十五章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在重视自然的同时,也突出主体人的地位,强调了道、天、地和人等四者的并立思想。几乎同时的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口号,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强调客观规律不可违的前提下,最是彰显了人的能动的主体性和主体的能动性。《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天与地作为外在自然或者规律性存在是人发挥作用的前提,人要发挥自身能动作用一定是在“参”天、“参”地的基础上进行。“参”就对人的行为有规范意味,不是肆意、不是妄为。《黄帝阴符经》最早明确提出“三才相盗”的理论,认为人的生命本出自天地,其生存亦必须依赖天地,故盗万物为己用并用道德来约束自己。李筌演绎的“盗机”论被后代道士津津乐道,为其“三才相盗”理论的高妙之处。自然规律“秘密”是客观存在的,人要去“盗”、去发现和利用,得之则为“得道”者,就可以成仙、长生。“三才”理论反映了先人的整体宇宙观,而且肯定了“人”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人的主体性思想还表现在对生命精神的弘扬方面。《周易大传》强调“生生之谓易”,“生生”与“变易”概括了生命本体的力量。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周而复始。一切都因生命的存在而有了意义。《周易》推崇乾阳之德,也是因为“阳”象征着“有为”“动”和“统帅”。“阳”代表着生命的力量,一切万物因为有了“乾阳”的启动、推动才得以运行、存在。儒家由此演绎出君子应具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格内容。体现了中国人高超的生存智慧,也成为古人自我激励、高扬主体性的标志。庄子在思想领域高扬着主体性的旗帜,他所构建出的“神人”“至人”“梦蝶”等无不表明其欲挣脱现实的“羁绊”向往绝对自由。魏晋时期社会处于失范

状态之下,玄学名士谈玄析理,解玄析微,言词高妙,体现出理性思维的智慧美、抽象美以及人为摆脱局促狭隘向往洒脱广大的超越品性。在看似纵情任性、放浪形骸、涂脂抹粉的表象中,深层意义却是对生命的珍视,对自我精神主体性的追求。道教对生命的推崇也非常明显,“道教的特色是长生不死,是面对死亡的主体性抗争。”^[2]主体性思想在隋唐时期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刘禹锡《天论》中强调天人相分,自然界(“天”)和人类社会具有各自的运行规律、职能各不相同,有时人胜天,有时天胜人,强调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与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人合于天”相比较,该主张更胜一筹。两宋时期,理气道器之争成为士人讨论的主题。在政治的倾轧之下,人的主体性几乎被湮没。陆王心学一系,颇有发扬主体性的倾向,但囿于自我修养的道德层面,未能将其发扬彻底。明末清初之时,国家适逢天崩地解之格局,出现了启蒙思潮,以王船山、顾炎武、戴震、黄宗羲等为代表的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强调发挥人的主动性、主体性的作用,提出具有“民主”意味的思想主张。戴震主张“适性遂欲”以及黄宗羲对英雄豪杰人格的大力推崇都极大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晚清,大批有识之士自动走出国门学习西学,之后反哺本国,较大地促进了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我国哲学史上的主体性思想是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强调天人和谐,体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这与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视野下的主体性思想相比较,大相径庭。西方主体性思想突出的是对自然的侵略和掠夺,如果说西方主体性思想具有更高的自觉性,主要还是体现在对自然的侵略和掠夺方面,而不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方面。西方人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觉思想,是现代工业社会极端发展后的产物。就是说,西方的主体性思想在内涵上,也呈现为发展着的和阶段性的特点,西方人是在极度破坏了自然环境以后才被迫发展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

同样地,我国历史上的主体性思想,在内涵上也是发展的,体现出了阶段性特点。如果说先秦时期还更多的体现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生存智慧和生态伦理,那么先秦以降,当中国人进入大一统社会生活后,则更多体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担当,以及对君子人格的塑造。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升到主体性高度的内容则相对较少了。近现代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影响到中国,随之而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等无视或轻视自然的片面主体性思想也影响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现实与人片面地发挥主体性有相当大的直接关系,但这并非主体性思想本身带来的。就今天而言,要实现生态文明,完成美丽中国的愿景,实现人的担当、完备且积极向上的人格塑造、责任心的培养,我们应该关注和反思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差距,发掘、承接并多吸收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生态智慧和生态伦理的内容。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生态智慧,中国古人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承接它们。

三、天人合一:和谐、审美与诗意

“美丽中国”这个大概念,体现在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内涵着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二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其三是审美与诗意的生活。“天人合一”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历久弥新的精神,其能指导人类文明持续生长,这种精神就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内核。

“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哲学中最具有概括性、内涵最丰富的范畴,儒、道各家共有之,作为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应该贯彻相互依赖、互相影响、人不能破宇宙的和谐之美的原则。在这样的思维中,“不仅是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3]

这种天人合一观念不但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而且对主体的道德要求极高,要求主体时时能够保持反思反省的品质。该理念所强调的人与天地万物“合一”“共生”“和谐”等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具

有直接的启示——即作为自然“对立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成果”的“我们”不能一味地沾沾自喜，醉心于已经取得的所谓成就，而代之以反思、反省的态度，认识并修正我们的错误。儒家的“仁爱”一般是针对人伦关系而言，似乎不容纳“物”的存在，但如果仅仅如此理解，就显得狭隘。张载在《正蒙·诚明》篇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凡能体悟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有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的人，必然能达“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程颐、王阳明等儒者把“仁爱”的层面扩展到万物之上，提倡“万物一体”，强调人与禽兽、草木、瓦石都为“一体”，见其“哀鸣”“毁坏”，生出“不忍”“悯恤”之心，这种扩展的“仁爱”思想不但为人伦道德提供了根源，而且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深层理论根据。与儒家“天人合一”相比较，道家的“天人合一”比较不重视人的主体性而特别强调顺从自然的“合一”层面。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从道家老庄的思想中体验到对生态问题的深层关切，其所强调的“无为”“小国寡民”看似有些消极的意味，实际上却能提供一种关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否定之否定”的借鉴，即人在大自然面前秉持的敬畏、尊重意义上的“天人合一”。非为如此，道教也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所谓修道是不违背自然规律，按照本来如此的方式生活而已。我国传统的中医中药理论中也有很多反映类似的内容，如《黄帝内经》揭示的四季阳气变化的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再要求人也应该按照这个规律进行养生活动。把人身体视为一个整体宇宙，讲究大小宇宙的和谐等等。

《人，诗意地栖居》是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后被海德格尔演绎为一个哲学命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向往。栖居不是人独有，但也表明自然环境是生命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诗意才能使人成其为人。在这里，“诗意”表征的是一种对生活的审美观照，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不仅要求人们善待自然、爱护自然，也蕴含深意——在人自身的幸福追求上，人应该以诗意生活而非物质生活作为目标。儒家认为自然是人精神和灵魂的归宿，更是人的审美对象和诗性源泉。孔子所谓“曾点气象”，程颢的《秋日偶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等感喟诗句，都是表达自己与自然的另一种“合一”状态。道家幻化的“仙境”逍遥境界体现的都是人在精神上与自然“合一”的状态。魏晋以及隋唐诗歌的许多内容都是作者“移情”的结果，他们从活泼泼的大自然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蕴。嵇康于“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无拘无束悠闲自得的情景中，忽有所悟，心与道合，“我”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既是对于道的了悟，又是一种审美，一种对于宁静的美的体验”。^[4]“山水花鸟”“松柏菊梅”等等自然的元素无不被诗人美化。我们能从古人的山水诗、山水画中领略美好的外在自然，也领悟到了作者的内心，体验他们那种在审美的生存方式和诗意境界中感受到生命的张力、适意、满足以及精神的愉悦。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提供了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态审美理念，古人所作诗、书、画无不把最高的美归为“自然”——自然而然。于是，我们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中体验到了“悠然见南山”的意境；道家也提供了文人行走在诗情画意之中的“隐”与精神上的“逸”，这一切的实现无不是在与天地万物、自然山水“交往”之际实现的。翘首云天，俯瞰山川，时而星垂云阔，月涌江流，时而鱼翔浅底，鹰飞戾天，整个自然界就这样活泼地展现在人类的眼前。佛教所强调的“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历程，参禅行走状态以及幽栖“孤峰顶上”的丛林生活等无不反映了佛教对自然山川的珍爱和怜惜以及对超越境界的追求。

如果说生态文明的核心在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话，那么其实质就在于怎样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观，还是道家的“法自然”、佛教的“佛性”理论，在重视天人关系的同时都将其上升到人与人关系的层面，可谓抓住要害。当然，传统哲学当中的“天人合一”毕竟有其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对自然的认识、对人自身的认识都处于朦胧和混沌状态，不能直接移植过来用于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今天，我们再讲天人合一思想，必须加入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和主体性思维。如此，既可避免西方近代把“主体-客体”奉为哲学最高原则所造成的流弊，又可以保持中华传统的魅力；既区别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又能发挥其能以高远的精神境界指导执著追求的作用，形成中国式的“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落实于当下，即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公有制为基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坚持“五位一体”,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

结语:美丽中国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生态问题愈演愈烈。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党和政府也正是在汲取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并借鉴西方现代生态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并深化了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理念——生态文明,并提出了具有诗意的美丽愿景——美丽中国。

党的第一、二代领导人虽未明确使用过“生态文明”概念,但对自然之重要性的认识却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如邓小平“自然环境保护同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很重要”,^[5]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人与自然关系。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向全党提出了“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上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组成内容。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征,突出了人与自然关系在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初步形成。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核心地位进一步明确,并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梦想。

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数字的变化反映了我们党执政理念对生态问题的关切。建设美丽中国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这个美好愿景实现的前提是生态文明的实现。所以,我们必须用生态文明的理论支撑起美丽中国。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顺应、保护,在此基础上积极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形成和谐、审美、诗意共存的美好状态。

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也是符合民本要求,更是惠利天下大事;美丽中国的实现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正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事业以外,还有我国传统哲学提供的那份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生态哲学资源。当古今中外之人类优秀资源都汇聚于当代中国时,美丽中国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76.
- [2] 李刚. 劝善成仙——道教生命伦理[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97.
- [3] 潘岳. 生态和谐观: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OL]. [2013-03-16].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61009/1524963888.shtml>.
- [4] 罗宗强.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96.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3.

Beautiful China——a Logical Outco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Philosophy

SUN Jinbo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evitability of accomplishing Beautiful China l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a's ecological philosophy is a condensation of it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that not only proposes man's correct attitude toward nature, but enhances man's subjectivity as well, which finalizes the ultimate aim of Integration of Nature and Man. China'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philosophy has become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source upon which the CPC is perfecting and clarifying its conception of govern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Beautiful 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philosophy; nature; subjectivity; Integration of Nature and Man

(责任编辑:于凤银)